

沈从文
与
东西方文化

赵学勇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沈从文
与

东西方文化



沈从文
与
东西方文化



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

赵学勇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0·兰州

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

赵学勇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兰州大学校内)

张掖地区河西印刷厂印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1/32 印张: 7 $\frac{3}{8}$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90 千字 印数: 1—3000

ISBN7-311-00322-9/G·107 定价: 1.75元

序

摆在面前的是一部出自年轻朋友之手的书稿，我愿意向读者推荐的，倒并非其中某些观点的大胆与新颖，因为对此每一个读者都是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对于一个总是在大起大落的评价中沉浮的作家，读者更是不必一定要与本书作者的具体见解认同的。值得注意的，却是其中时时隐含并昭示的独特的观照视角和研究方法。因为作者确实构筑了一座只属于他自己的灯塔，并用这灯塔照亮了他的研究对象——沈从文这样一颗长期孤寂的灵魂以及似乎不再闪光的文学艺术世界。

我之所以如此看重研究方法，是因为我感到最终对学术发展产生影响的往往不仅仅是论文的某些观点，而是研究方法的突破。在这里又由于研究方法的选择完全来自作者对研究对象的深层把握，从而使赵学勇在他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间寻到了一种共振点，这就保障了这种研究最终将有新的突破；另一方面又由于这种研究方法确实是作者特定的智能结构与思维方式中生发出来的，所以不含一丝造作。

把沈从文置于当时的世界大文化背景中去审视，这本身就显示了一种研究气魄。而文化——心理视角的选择，无疑与前些年的“文化热”有关，因为这确是赵学勇研究沈从文文化——心理结构的大背景。一个真正独立的研究者，绝不是使自己消融于这个背景，而是在这个大背景上更明确的实现自身的独立价值——在任何一种热势中保持自己思维的独立与冷静是多么不容易啊！听说1988年10月在京举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赵学勇曾力倡他的文化——心理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的“互补说”。我们欣喜地看到这种“互补说”在这本书中得到实践，当然，成功与否还有待读者的评说。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比较文学方法的运用。这里有平行研究，有影

响研究，更有跨文学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比较研究绝不仅仅作为一种机械的方法，而成为一种精神，渗透于各个研究角落。对于影响研究，作者一方面注重扎实的资料清理，但更注重接受者的接受前提以及影响源的变形。在平行研究方面，不仅仅作一种机械的比附，而是结合各自的文化背景作各种角度的阐释。所有这一切都不仅仅为沈从文研究开拓了新天地，而且为比较文学方法论提供了一些成功的范例。

吸引我的注意力的，还在于作者把对他的研究对象的审视，变成了一种“对话”——一种饱含情感色彩的“对话”。也许正因为作者冲破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难免存在的心灵障壁，使他的研究得以从感性的体认中升华出闪光的理性之花。在赵学勇和沈从文之间，似有一深层的共通点，正是这共通点构成了这种“对话”的前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灵感应呢，读者又是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我感受到的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相通的忧患意识和创作激情、以及由这激情导致的对一般文学文本研究范畴的超越。赵学勇近些年来虽一直沉醉于沈从文研究，但却不轻易发表文章。他自己说，他崇尚那种沈从文式的寂寞，但这也不全对。直到读了书稿，其中第一篇开首的那段引言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沉思：

不管它是带咸味的海水，还是带苦味的人生，我要沉到底为止。这
才象是生活，是生命。我需要的就是绝对的皈依，从皈依中见到神。

——沈从文《水云》

对了，这也许就是他们“对话”的真正前提。我深信，在这一点上赵学勇抓住了沈从文的真精神，同时他也力图去体悟真正的人生。这是赵学勇这次尝试的一种动力。我深信，成功必将属于艰辛的跋涉者。是为鼓励，亦为序。

吴小美

1989年10月于兰州大学

内 容 提 要

（一）生命——哲学（上）

西方现代主义“生命哲学”思潮的文化意义：企图借助“文化势力”，推动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五四”及其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重建”使命。农业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沈从文的“生命”哲学意识，是他全部人生经验和审美理想的哲学概括，它与西方现代主义“生命哲学”思潮相共鸣；集中表现在与尼采的“意志”学说的心理感应。

（二）生命——哲学（下）

对“文明”的心态反映，使沈从文在文化层次上与西方近现代以来一大批作家相呼应。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三家哲学对他的影响更是明显的：一方面熏陶了他的心灵品格，丰富了他创作的文化意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他文化视野的局限。而他“生命”哲学的真正实践还在于经历了对现代中国社会人生的深刻体察；形成自己独特的“生命”哲学观念，并以其为基调的总体构架折射于他的全部创作中。

（三）审美选择

中国现代革命和文化建设所规定的作家审美选择的多样性。以善、美为主体的审美选择，是沈从文哲学意识的实践反映；其特征表现为审美超越性——与人类文化发展的最终认同。“生活”与“生命”：“具体”与“抽象”的诠释。“湘西世界”的文化构成是他反

省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因长期积淀而无力自强振作的契机。中国农业文化中积极的精神资源是他审美理想的重要价值取向。从社会学角度与文化学角度二者“勾联”的理论思考看沈从文，以及对现代作家研究的普遍意义。

（四）人性·伦理·道德

人性复苏和自由意识构成了沈从文文化心态的重要内蕴：以自然生命形式对抗“文明”教化下的人性沦丧构成了他创作的基本体式；对伦理道德的关注，是通过对处于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农业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战中的中国人精神面貌的展现，特别是对都市文化型态的批判，期望从恢复人性自由和道德完善中寻求社会进步的必然性；深沉的逆向文化心理并不是“复归”传统，而是一种独特的反拨形式，其目的仍然是着眼于现代文化的建构。

（五）文化重构

近、现代以来文化重构的历史延伸。“人的重造”与“民族精神的重造”，是沈从文在现代文化建构中的总体心理意向；这一命题是近、现代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重大任务在走向30年代的延续，来自他对封建文化的彻底否定与批判。现代西方文化、中国农业文化、苗文化三种文化的碰撞融汇，构成沈从文重建民族文化心理和创作的独特文化景观。部分当代寻“根”作家与沈从文创作心态的共鸣，再一次反映出处于两个不同时代的作家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探掘与美学追求。

（六）历史反思中的沈从文研究

走向多维视野——真正走向科学的实践——突破；学科深情地呼唤“沈研”的新前景。

目 录

序.....	(1)
内容提要.....	(1)
引言.....	(1)
生命——哲学(上).....	(5)
生命——哲学(下).....	(43)
审美选择.....	(88)
人性·伦理·道德.....	(130)
文化重造.....	(165)
结语.....	(201)
附录：在历史的反思中探索	
——近年来沈从文研究述评.....	(204)
后记.....	(226)

引 言

中国文化的命运在走向本世纪初时发生了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它的光辉起点是“五四”。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界碑，它的丰厚内质不仅体现在政治型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方面，更重要的特征却在于真正显示着中国从此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这种历史性转换的标志是由近代政治型的文化运动向现代文化进程的总体转移。

众所周知，从1919年至1921年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发生过3次重要论争：马克思主义者与胡适等人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者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马克思主义者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的论战。3次论争都曾被作为“阶级的分野”或“阶级斗争的表现”载入现代史册中。实际上，3次论争的实质都是在围绕中国如何走现代化道路的问题，都是属于思想领域内文化型的论争。

固然，由于中国特定的现代历史环境所形成的强烈的民族爱国集体意识，往往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强化从政治或社会学角度看待自己的文化遗产，这无疑有其值得重视的一面；但它的偏颇性和由此所造成的弊端却也是显而易见的。其局限是无力从文化发展的广阔层面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作出精确的判断和科学的估价。中国近代与现代的文化运动，既然是“文化”运动，就应该从文化的角度对之进行考察，而不能只从政治的角度掩盖文化本身发展的丰富内涵。而文化角度的考察，又是更宽泛、更复杂的历史观照，为此，也是更难绳之以某一两种尺度或给予普遍都能接受的准确的界定的。

文学是文化心理的象征性表现。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一

翼的文学革命，它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在其发端的现代思想启蒙性上，理所当然和无可避免地要把唤起民众的觉醒当作文化革命的先声。因此，这使我们还难以从新文化运动发难刊物的《青年杂志》中找到真正的文学作品。虽然如此，但它的“文化启蒙”色彩和“文化重构”目标却是最鲜明的。随着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深入，一大批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先后自觉地走向对自身本位文化以及由此形成的长期心理积淀的全面反思，这种反思的强大推动力又来自中西文化碰撞的大潮。在面对多元文化选择的“五四”高潮中，一批卓越的文学家（以鲁迅为代表）率先以自己的创作实绩观照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他们以冷峻的眼光在对历史文化的审视与批判中，拉开了中国文学走向真正现代化的帷幕。这是中国文学的旧时代的终结，现代化的起程。

碰撞中的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和渗透，使得中国的知识者呈现出空前的大惊喜、大躁动、大忧患，这种大惊喜大躁动大忧患首先是作家自身的解放和他们呼唤现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从而使他们获取了开阔而深沉的文化批判视野。——批判过去、正视现代、瞻望未来；兴奋、不安、恐慌、孤独、彷徨、追求，溶化成现代知识者的典型情绪，也溶化成他们作品世界的典型情绪。那种笼统地把中国现代文学归结为政治的舆论工具，缺乏伦理的表现和心理的探索的论断是偏执的。^①这种论断只是看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同现代中国革命在表层结构上同步的一面，而断然割舍掉中国现代文学在深层结构上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全面反省和强烈震撼。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群体，无论是追求写实的“为人生”派还是“表现自我”的“为艺术”派；无论是各自为阵的作家个人还是以共同目标为依托的作家团体，他们之间或由于目标的相异而发生论战，或由于个人理想的追求不同而一度产生误会、隔膜，但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

^① 参见夏至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总体观照的心绪却是一致的，这里只有程度深浅的不同。多年来，单一的社会学批评尺度和理论框架使我们难以从文化的角度，深入研究和探讨一批现代文化人的思想和创作，他们从文化心理的局面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以及文学等领域探索中国的现代化出路问题，对此，应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并给予历史的再评价。不可否认，这一批文化人中的许多人对现代中国革命的性质理解，缺乏深刻的历史眼光，甚至有的人最终在政治上走向了反动（如胡适、周作人等），但他们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多维探讨仍然有其不可忽视的文化意义和创作价值。在这里，评价的尺度应该将严格的政治界限与文化的意义和创作的价值区别开来。

当我们从现代文化建构的艰难步履中来觅取、再审视，我们便进一步获得了新的认识和估价中国现代文学全部丰富内蕴的可能，对象沈从文这样的作家也找到了重新认识和估价的窗口。“文学研究者感兴趣的也只是它们有别于同类其他事物的个性以及它们的特异的面貌和性质”。同时，我们“强调每一艺术品的‘个性’，以至它的‘独一无二’的性质，虽然对于那些轻率的和概念化的研究方法来说具有拨乱反正的作用，但它却忘记了这样的事实：任何艺术作品都不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否则就会令人无法理解”。^①在现代作家群中，沈从文的确是特殊的一个，这种特殊性规定着他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既不属于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创作主流，又区别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艺术追求；既不同于革命派作家的创作情致，更同那种迎合时人的趣味文学大相径庭。而那些轻率地把沈从文的创作归结于没有表现出“我们的世界”，是取消一切阶级关系的“世外桃源”，甚而是“地主阶级的弄臣”的结论更是肤浅的。但沈从文又绝非一个“怪物”，他构筑的文学世界突出地体现了文学作为文化心理的象征性表现的特征。他对中国现代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独特思考，

^①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

并着重从文化心理的广阔层面进行发掘，以显示自己的审美追求及价值取向，构成了沈从文文学生涯的整体走向。

综观沈从文的思想发展和创作历程，构成他文化性格、思想意识、心灵品格的内在机制的核体仍然是对我们这个民族由农业文化向现代化过渡时期，在走向全面衰弱和崛起解放历程中的恐慌感和忧患意识。这种恐慌感和忧患意识集中体现着一批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它是作家自我意识的进一步深化，是现代意义上的思想自觉和精神表现。沈从文处于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由初始走向深入的重要阶段，他的创作明显地蕴含着现代文化建构过程中的某些重大现象。他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探索，与鲁迅的精神脉络有相联系之处；他对现代文化和现代人精神世界的重建理想以及所表现的复杂心理现象，比老舍、冰心、郁达夫具有更深长的意蕴和文化意义上的延伸性。在创作上，他又以自己独特的审美方式表现出来。这不仅规定着沈从文作为一个现代文化人的条件根据，而且促成他跻身于世界关注的少数中国现代作家之列。

为此，一旦“当我们进入了他的透镜，我们就不得不以他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仿佛就象我们以前从未从这种特殊的方面来观察过这世界似的。”^①让我们借助这段话作为探视沈从文在现代文化建构中的历史面影的契机。

① 卡西尔：《人论》。

生命——哲学

(上)

不管它是带咸味的海水，还是带苦味的人生，我要沉到底为止。这才象是生活，是生命。我需要的就是绝对的皈依，从皈依中见到神。

——沈从文《水云》

1

当人类历史处于被理性文化紧紧束缚着难以自拔的困境时，当世界面临现代文化的驱迫，再也无法控制自身的时代变革中，“上帝死了！”——这一声耸人听闻的呼喊，把整个西方从理性文化的沉梦中震醒了！在这个没有“神”主宰的世界，人类怎么办？尼采提出，要以人的强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要建立超越的人格！并以此作为“人类自我认识行为的最高公式”。^①尼采的狂举躁动，是对西方中世纪以来宗教哲学统制人们精神的最强劲的冲击，他无疑代表着西方文化在走向现代过程中，一大批勇于探索的知识分子的典型情绪。尼采的“价值重估”极其广泛，几乎涉及到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对于艺术，他从“审美形而上学”原则出发，认为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这种回到生命本体的艺术，“只有作为

^① 尼采：《看哪这个人》。

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①在这里，且不论尼采思想的唯心主义根底，仅其对艺术创造者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体”存在的确立，作为对审美“主体”的精神思维活动的认知，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现代”程度。

几乎稍先于尼采的叔本华则直接是“生命哲学”的启蒙者，他极力强调的“生命意志”学说，犹如狂飙摇撼了自苏格拉底以来构筑了数千年的理性主义的堡垒，象一道闪电划破了黑格尔理性主义的浓云所笼罩的苍穹；这位人类文化史上的“怪杰”，由于一意孤行地张扬“生命意志”对整个人类的绝对制约性，以至最终导致了否定世界和人生的悲观结论。在这里，尽管我们不能尽情评说尼采、叔本华对开创西方现代文化历史所付出的巨大艰辛和贡献，然而，在西方文化由近代向现代跨越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由尼采、叔本华所高扬的“重估一切价值”和“生命意志”学说，却成为“这时代哲学气质所起的最显著的变化。”^②随着这种“最显著的变化”带来的是整个西方哲学、美学领域所形成的一股强大的“生命哲学”思潮，呼之而出的是一批卓越的追随者和阐扬者——狄尔泰、齐美尔、柏格森、弗洛伊德、弗罗姆、詹姆士、以至东方日本的厨川白村，他们或从哲学的、或从美学的、艺术的不同角度将这一学说尽情发挥，又显示出内在的精神联系——即把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置于最显眼的位置，极力强调人对自然和社会运动的创造性作用。

“生命哲学”思潮的倡导者们面对西方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自然科学危机和人文科学危机，企图寻求文化哲学上的开脱，寻找现代人精神上的失控与平衡。从理论意义上看，它深深地打上了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烙印，受制于现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过程，并处在发达工业国家的社会心理氛围中，必然要反映出“世纪末”时代的冲

① 尼采：《悲剧的诞生·前言》，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②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

突、变革、矛盾和“病症”，现代人的痛苦、挣扎、呼声和向往。而“生命哲学”思潮的倡导者们注意的焦点是文化的势力，他们希望从文化观念方面来消除资本主义的“不正常”状态，从文化领域来铲除压抑、束缚人性自由的社会意识形态，从而走向人的主观性和能动性的张扬。

在那些重构西方现代文化的哲人身上，他们把文化革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解放事业。在他们眼里，这场文化革命完全不同于以往所有的社会革命之处在于，“它是深入到人的内心观念、心理本能结构和日常生活中，从而彻底改变人自身的革命。因为，只有当人认识了自身及其历史，弄清了“文明”灾难的源头就在自身，他就会自觉地去改变自己，从而改变他的外部现实。”^①然而，在有“史”以来，由于大众往往受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历史文化结构的束缚以及日常生活的腐蚀，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仍然把资本主义的消费世界当作唯一合理的秩序。对此，批判现实和超越现实的文化革命只能由少数先觉的知识分子、先锋派艺术家和清醒的哲人来发动了。这种把人的主体性和人类的解放紧密联系起来，用“文化”决定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学说，尽管不可避免地最终陷进了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泥潭，但在其现代意义上，它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文化”意义不足的弥补和深化，其实质是“现代文化的冲突”。而这股强大的哲学思潮在20世纪初已被提到西方哲学的中心地位，并形成观照一切现象和一切价值的出发点，是与其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理论概括和审判眼光分不开的；它对西方文化在现代迅猛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又是其他文化型态所难以替代的。在我国理论界，在对历史的评判中，由于单一的社会学批评定势占据着牢固的主导地位，因而，对以尼采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人也采取了“绝对”挹伐的态度；在对“五四”文化革命思想启蒙意义的认识和评估

^① 欧阳谦：《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上，不能不相对忽略甚至贬低了一大批先驱者（包括文化伟人鲁迅在内）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卓越建树。今天，这种历史评价的失误应该得到充分的拨正。

2

中国现代文化的起步与建构，固然是对自身民族文化长期固步自封、停滞不前的决裂与叛离，它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先驱者的觉醒，首先是从西方现代文化中“拿来”了强有力的思想批判武器，作为向封建文化体系的顽固堡垒进攻的理论装备。“五四”时期，在中西文化碰撞交融大潮中，“生命哲学”思潮随同马克思主义及其他西方文化思潮同时涌入窒息已久的中国大门，成为中国一大批现代文化人反封建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在文学领域，“不是中国作家用现实主义精神去吸取西方现代主义技巧，而是现代主义思潮所体现的思想意识，吸引了中国作家们的注意。”^①这股思潮的涵化面远远超越了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而扩大到了文化的心理的广阔层面。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独特思路和独特性质在于，作为中国文化史上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空前的、大规模的文化冲突，它不仅从根本上区别于我国历代知识分子——“士”的阶层的思路，而且也 and 近代思想家们的思路迥异，甚至与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的思路也有质的差别。这种区别的质变点是，它给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提供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全新认识，并开始了总体性的反省和自救性的理性批判。而这种“理性批判”的文化武器之一，就是来自以尼采为代表的西方现代“非理性”哲学思潮。20世纪中华民族思想解放的历史要求最初竟然在德意志帝国哲学家的“超人哲学”中找到了喷发口！可以看到，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哪一个没受过尼采学说的影

^① 陈思和：《中国文学发展中的现代主义》，载《上海文学》1985年第7期。